

论如何也轮不到苏联。

美国政府手中没有舆论工具，就是一个美国之音，还只能对境外广播。立宪建国之初，媒体攻击开国总统华盛顿时使用的恶毒诽谤和肮脏词语，“甚至在人们形容像古罗马暴君尼禄那样的人物，恶贯满盈的骗子，乃至人人喊打的扒手时，都不屑使用的。”杰斐逊有一次亲眼见到，华盛顿板着脸看了一眼报纸，然后把它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并恶狠狠地骂道：“混账”。现如今，连美国的中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杰斐逊等开国先贤都是贪婪无耻、恶贯满盈的大奴隶主。

在国防和军事领域，美国总统虽然身兼美军总司令，但是，军费预算权、战争拨款权、对外宣战权、准将以上的高级将领任命权，等等，全部掌握在国会两院手中。就此而言，美国总统其实只是个“光杆司令”。为了严格限制总统的军权，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期间，一位制宪代表提议，美国宪法应当明文规定，将美军总兵力限制在3000人以下。华盛顿将军被气得七窍生烟，讥讽说：“美国宪法没准儿也应当拒绝敌国拥有以3000人以上兵力入侵美国领土的权力。”

东来深有感慨，一个国家何以如此多元化而不至于分崩离析，一个社会何以如此光怪陆离、自由开放但仍然繁荣发展，一个民族何以如此混杂而居却不至于四分五裂。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最终引导他走上了“打通内外”、转换学术方向的道路。

从严格意义上说，东来不是那种特别勤奋的学者，坐不住“冷板凳”，喜欢高谈阔论，纵议天下，东游西逛，四处游历。我们曾一起去参观过水门大厦、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仅凭一本中国护照，即可进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办公室（外厅）参观。在五角大楼的“五星上将马歇尔纪念馆”，我们还看到一张马歇尔与江青在延安的合影，相当罕见。江青身着美式黄呢子军大衣，居然相当神气。

没过几天，东来又拉我去旁听联邦最高法院审案和国会听证会。可是，我正忙于实习和找工作，没那么多闲功夫陪他。我开玩笑说：“游手好学好”太奢侈，你还真把自己当托克维尔啦？东来碰了一鼻子灰，独自一人去了国会山，收获极大。他看到了“护旗派”示威游行的盛大阵容，进一步启发了深入思考，开始注意搜集美国宪法案例方面的资料。

回国后，根据直接观感，东来在《读书》1995年第10期发表了《在美国焚烧国旗是否合法？》一文，详细介绍了“烧国旗案”的来龙去脉，文笔流畅，点评精当，思考深邃。此文成为东来“改行”的起点，后来被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编入教材。东来将“烧国旗案”复印后寄到美国，使我大开眼界，深感兴趣。

十六、从犹豫不决到携手合作

我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当年对美国法律有个初步印象：罪犯的人权，好像比受害人的

人权还要重要；保护坏人，好像比保护好人还要优先；针对警方执法的清规戒律，好像比打击罪犯的法律法规还要多；律师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能耐，好像为民请命、维护正义的本领还要大；由清一色外行组成的陪审团，好像比精通法律的职业法官还要有权威。尤其是确立嫌犯沉默权的“米兰达警告”，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个难解之谜。美国最高法院为何如此荒唐断案？大法官的脑袋瓜是否出了毛病？信不信由你，这些法律问题曾使我深感困惑。

1996年，我任职于一家由数位女士经营的电脑公司。因涉嫌以虚假信息投标联邦政府“平权措施”项目下的电脑软件工程，该公司一度遭到联邦调查局暗中调查。在员工会议上，老板临时聘请的一位大牌律师反复警告，如遇联邦调查局特工“登门拜访”，一定要“保持沉默”，不要被那帮“狗娘养的”狐假虎威、威迫利诱所吓倒。

我告诉律师，我不是美国公民，也没有绿卡，目前只有工作签证（H1），“米兰达警告”对我是否适用？律师说，没关系的，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不仅保护美国公民，而且也保护外国侨民。

出于好奇，后来我认真拜读了米兰达案的判决书，同时顺藤摸瓜，阅读了主持此案的沃伦大法官的回忆录，蓦然间，产生一种有话要说的奇特感觉，遂速成一稿，题为《米兰达法则与美国宪法修正案》，登载于《读书》2000年第7期。

或许是“天意”，东来恰好在该期发表了《自决权的三种形式》，而且与拙作页码相连，紧密为邻。这样，他无意中读到了我的新作。东来吹捧说：国人做了百年宪政梦，可是，什么是宪法，什么是宪政，多数人仍然还是一脑门子浆糊。你的“米兰达案”在此领域的借题发挥，实属难能可贵。

2000年底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后，我突发奇想，联系美国宪政史上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写了篇习作《美国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力是谁给的？》，分别发表于广州《南风窗》、美国《世界日报》副刊《世界周刊》、网络电子周刊《华夏文摘》。非常凑巧的是，几乎在同时，东来在2001年第2期《读书》上发表了《司法审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杀手戟》一文，其主题恰好也是美国大选和马伯里案。

东来回忆说：“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难产，最高法院的判决一槌定音，让我再次感受到了法治的权威。多年来对美国的观察和研究，促使我思考美国繁荣强盛的本质，或许宪政是一个根本的因素。”于是，东来决定：“我将努力寻求一个法治相对健全、宪法为其立国之本社会的法治精粹和宪政经验。在具体作法上，利用自己作为历史学者善于叙事、对细节的敏感和对美国历史发展背景熟悉的优势，来讲述美国宪政法治发展演变的故事。”

在此背景下，东来前后两次向我建议：我们第三次携手合作，写一本介绍美国宪法案例的法律读物。由于英美普通法系遵循前例、追溯历史的特点，对美国历史和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比较熟悉的学者可以大有作为。这类书在美国被称为通俗历史（Popular History）。从经

院学术的角度来看，不属于阳春白雪。但是，在学术水准方面，我们一点也不能含糊，研究要扎实，思考要深入。

对此建议，起初我有些犹豫不决。一是觉得那些案例习作水平太低，难登法律殿堂。二是我们以前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合作经历（调研报告，朝鲜战争决策），刻骨铭心，不堪回首。三是我有自己的业余写作习惯、工作节奏和“宏大设想”，不想把文章与东来大作搅和在一起。

可是，东来不以为杵，来了个“三顾茅庐”，说是已经联系好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后改为中国法制出版社），牌子很硬，条件优惠。于是，我就没有继续不知好歹，不识抬举。我们商定，不写那种高头讲章、繁琐考证的枯燥学术，不写那种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戏说演义，而是采取“以案说法”、“以事说理”的“讲故事”形式，避免过多的法律概念和空洞的法理论证，注重从历史渊源、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制度背景等更为宽阔宏大的视角讨论美国宪政历程。

还有，当时黄仁宇先生的大作已经风靡大陆读书界，长盛不衰。此公以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使学术著作成为大众的精神美食，对我们影响很大。由此，我们非常注重文字流畅，雅俗共赏，力争“熔学术著述的准确深刻和通俗读物的流畅生动于一体”，普及宪政常识，尽量扩大读者面。

当谈及“合作条件”时，东来颇具主将气度，对我格外优惠照顾。在商定的全书重大案例之中，除了以前写过的之外，我可以任意优先挑选自己感兴趣的10个案例，把那些枯燥乏味、史料难觅、不易发挥但却意义重大、不可或缺的“疑难案例”，一骨脑全甩给了东来和另一位合作者白雪峰。这样，连吹捧加优惠，我晕晕乎乎地被东来拉上了“宪政贼船”。

东来起初提议，书名为《美国最高法院的伟大判决》，后因“斯科特案”臭名远扬之故，必须换个书名。他建议《美国法治的故事》。我认为绝对不行，听上去简直就是幼儿园小朋友的启蒙读物，应改为《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东来认为绝对不行，听上去简直就是路边地摊卖的侦探破案读物。最后，俩人一致同意，书名为《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

十七、王希教授的影响以及李道揆先生

东来决定“改行”后发现，涉及美国宪政的英文参考书车载斗量、汗牛充栋、非常专业，但是，高水准的中文参考书寥寥无几、寥若晨星。按照他的说法：“宪法宪政领域，特别是美国宪法，专业性很强，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内的宪法学者和美国史学者，很少有人去研究美国宪法史。”

大概在2000年，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主任王希教授（现在是北大的长江讲座教

授)在南开讲学,赠送东来一本他的新作《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东来认真拜读后,收获很大,深受启发,觉得在美国宪政领域大有探讨和深入研究的余地。他立刻向我隆重推荐此书,并且迅速买了一本邮寄到美国。

《原则与妥协》堪称中文世界最出色的美国宪法史专著,结构宏大完整,史料翔实丰富,分析全面深入,结论精辟中肯,学术规范严谨,对美国宪政的起源和历史演进作出了全面完整的叙述,对美国宪法的原则、特征、意义及其涉及的思想观念、利益关系和历史背景进行了出色的分析和说明,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地位、作用、影响及其经典案例作了精彩的介绍和评论。该书成为我们撰写《美国宪政历程》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学习榜样和学术典范。

最令东来和我佩服的,乃是王希教授的英文大作《民主的考验:1860-1910年间北方共和党人和黑人选举权问题》(The Trial of Democracy: Black Suffrage and Northern Republicans, 1860-1910,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7)。该书基于王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用准确流畅的英文写成,1997年出版后在美国史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王希教授以美国民主的个案为研究课题,以严谨的实证方法,深入美国南方城镇,广泛搜寻第一手文献,同时参考学术界既往研究成果,对内战后北部共和党人在黑人选举权问题上的立场、措施以及所引起的政治斗争,进行了不动声色、冷静平淡的历史叙事,予以遣词中性、貌似缺乏惊世宏论的深入分析。目前国内美国史领域最负盛名的学者李剑鸣教授评论道:“在这种平静的历史叙事背后,潜藏着一位中国学者对美国民主的独到观察。”

想当年,胡适、陈寅恪、钱钟书、冯友兰等大学者号称学贯中西,其实,人人皆知,他们全是靠“国学”在欧美名牌大学拿到学位,在“西学”领域并无独家真功。胡适先生关于美国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高论阔论,常常流于泛泛而谈,当年并未在知识青年中造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百万留学生负笈海外。可是,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等原因,大约99%左右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仍然是凭借“中学”或“中西比较”在国外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其“西学”的含金量其实并不太高。王希教授不走捷径,迎难而上,在一流名师的指导下,以高度的史学素养,凭借严谨扎实的学术努力,在“西学”领域取得了出类拔萃的成果,令人深感钦佩。

《原则与妥协》第一版有个小毛病,因校对不精,中英文错漏之处,实在太多。该书修订版的清样排出后,我不揣浅薄,主动请缨,认真校对了对新版书稿,主要目的是再次精读一遍这部大作。王希教授为人谦逊,举止低调,礼节周到。有一次他来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做研究,特意设宴请客,感谢我的微薄之劳。

席间,王希教授谈起,当年社科院美国所有一位留美出身、对美国宪政颇有研究的大腕

学者李道揆，学识渊博，见解深刻，关心后学，对他撰写《原则与妥协》助益甚大，两人在电话中经常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他问道：任东来和你当年听过李先生讲课吗？有过什么师承和影响？

我回答说，当年美国所确实有这么一位美国宪政大腕。学生们调皮捣蛋，假装没文化，故意念别字，背后把李老先生称为“李道揆”，把美国所一位据说曾为江青看英文电影时当口译的李森研究员称为“李三水”。李先生主讲的美国政治课程，大概是在1985年秋季，当时东来已赴南开，失之交臂；我已开始专业课学习，无暇旁听。只记得，当年美国所的同学经常议论李先生的课程，一致认为博大精深，精彩绝伦，启人深思。可是，不知为何，李先生门下的几位高徒，后来都没有继承导师的学术衣钵。其中金灿荣后来考上北大教授袁明的博士生，成为美国外交专家，出任中国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李道揆先生将讲课的手稿精心整理，于1990年出版了耗费12年心血而成的大作《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荣获中国社科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该书是东来和我学习和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参考书。

《美国宪政历程》之所以获得一定成功，成为学术畅销书，其实主要是一不留神赶上了“宪政热”，反映出读书界对宪法和法律知识读物的渴望和需求。同时，它也是学习和继承前辈和同辈学者学术成果的产物。

十八、“南京市鼓楼区的奥巴马”

在日常生活中，东来是宪政法治与民主理念的实践者。自2007年夏季，他一改以前对行政管理缺乏兴趣的态度，积极投身南京市鼓楼区“曲水文华苑”小区业主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和小区自治实践，拥有了生平第一个“民选”的“行政职务”——业主委员会主任。他发挥善于交流沟通的特长，以出色的协调能力，费心劳神，热心公益，卓有成效地维护了小区业主的经济权益。

有一次，东来颇为自豪地开玩笑说：“兄弟我现在是社区领袖（community leader），相当于南京市鼓楼区的奥巴马。”

我回应说：“呸，你小子就瞎吹吧，人家奥巴马从政前在芝加哥黑人贫民区当社区领袖，如今你任东来是在南京城里的富人住宅小区当社区领袖，这两者之间，八竿子都打不着，任大摆忽的本事，真是不减当年呀。”这番玩笑话，说得有点儿过于刻薄挖苦。人情世故方面不够圆滑之人，正是我自己。

“南京市鼓楼区的奥巴马”虽系自我调侃之语，但在某些意义上，却正是东来脚踏实地、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宪政理念”。

托克维尔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定一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

代替公序良俗、社会民情。美国民主得以长久而稳固，原因之一在于，立宪建国之前各乡镇处于自治状态，基层和地方分权先于政府集权，人人平等，各尽其责，自我管理，每个人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和社区管理，注重公共品德，同时维护个人利益。为了公共福祉，民众以契约形式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政府，并予以严格监督和精妙制衡，而非权威无边的官府老爷恩赐和施舍民众权利。

十九、“用命搏真知”与天妒英才

东来逝世后，我在《北京青年报》看到一幅挽联：

用命搏真知，英年才俊又西去；

以点观大局，远邻智慧向东来。

我觉得，“用命搏真知”之语，用在东来身上不够准确。他是一个开朗乐观、谈吐睿智、才气纵横、相当潇洒的学者，不是那种悬梁刺股、皓首穷经、过于执着、自视“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物。在现代社会，做学问其实就是一项普通的工作，谈不上什么高尚的目的，也没有什么悲壮的人生意义。

历史是一系列尚待解答或尚待完善的问题。美国宪政历程是具有特定背景、特定经验、特定意义的历史实践过程，而不是一系列确定的客观真理、绝对真知和标准答案。根本不值得任何学者“用命搏真知”。

东来对待学术事业，其实主要是出自内心深处的热爱和激情，有强烈的求知欲，有搜寻查找资料、搞清楚疑惑问题的强烈冲动，有时甚至到了忘我境地。对东来而言，每一项新的研究，都是“一次愉快的精神之旅”，而且迫不急待要与别人分享感受。你想不听都不好意思。

我与东来之前的合作，也是“愉快的精神之旅”。唯一的小分歧，是他认为我的文字有时“过度口语化”。我不服气，认为他实在是少见多怪，史学大家唐德刚教授著书立说，就是这种套路。可是，在最后统稿时，为使全书风格基本一致，东来一点儿没客气，把我的文字删掉了不少。

东来祖籍江浙鱼米之乡，我祖籍陕北黄土高原。有一次他登门拜访。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了刚学会的川味豆瓣鱼、担担面、鱼香茄子，香气扑鼻，十分入味。没想到，东来根本就不能吃辣，鱼、面、茄子用清水冲洗后，他才能勉强下箸，非常扫兴。当然怨我，居然没打听一下他的祖籍和口味。当我炒菜时，他在另一房间埋头看书，对味道仿佛充鼻不闻。在很多方面，东来是个大大咧咧、稀里马虎、甚至比较缺心眼儿的人。而我在多数情况下比他更缺心眼儿。我想，这大概是我们能够成为朋友的原因之一吧。

东来英才早逝，令人扼腕。毫无疑问，他是一代英才，领军人物，但与史学大师、一代

宗师等称号相比，尚有差距。在我看来，他的学术研究刚刚“渐入佳境”，远未抵达至境高峰。他独辟蹊径、打通内外的研究风格，在目前国内美国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独当一面，独步一时，独领风骚。50出头的年龄，正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综合能力的高峰期。东来英年早逝，乘风归天，真的是太可惜了。

说起来，东来不胜酒力，饮食有节，从不抽烟，爱睡懒觉，性格开朗，为人洒脱，喜欢旅游，遛狗散步，没有人到中年之后，在家庭、婚姻、子女、事业、经济等问题上的沉重压力。他从不督促女儿琬洁努力学习，反而抓住各种机会，领着孩子外出尽情玩耍，一点儿也没个老爸的样子，一度让夫人吴耘非常头痛。

东来的仙逝，恐怕只能解释为天妒英才。

二十、唐代诗人于鹄有一首《别旧山》

2012年春季学期，东来在美国格林奈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担任访问学者。回宁后，他于6月17日前往北京，主持了颇有名气的共识网读书会（主题《美国宪政历程》）。会后，我发一电邮给他，打听读书会的盛况。

7月17日，东来回复：“伟兄：你可能有些疑惑，我为何迟迟没有回信。这次，哥们儿是“不幸中弹”，需要“治疗性休养”。我在美期间总有疲倦感，人瘦了很多。回来后，琐事缠身，从北京讲课回宁后才去检查，医生怀疑是鼻咽癌，经过复杂的病理检查和PET-CT检查，现在确诊是恶性淋巴瘤，还好发现得及时，今天就住院，主要是放疗和化疗，比较痛苦，但我对治愈还是信心十足。”

看了电邮，我仿佛陷进了大东北冰天雪地的荒草甸子，浑身上下，透心冰凉。你看这个东来，已经查出了癌症，居然还有心情搬出王立军“治疗性休养”的典故调侃。东来对此案一直追踪关心，一再感慨，美国的在华领馆，如今已沦为高官的“联邦上诉法院”。

2012年12月29日，是东来与我在电话中最后一次长聊。听上去，他似乎心情甚佳，豪情万丈，声称在京化疗和放疗的效果很好，病灶已全部消失，北京医疗条件很好，立体定向放射技术非常先进，没有造成掉头发、食欲不振等副作用，目前起居一切正常，甚至还开玩笑说，这辈子活到80岁肯定没有问题。

令我吃惊的是，在京治疗期间，东来居然还有闲情逸致，像顽童一样偷偷溜出医院，拜访了美国宪政研究领域中的后起之秀、译著颇丰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电话中，他还主动提出，愿意在《美国宪政历程》的增补版中承担“禁枪案”的撰写，并把全书正文开始前的几篇宪法论文整合为一篇。通完电话，我非常高兴，感觉云消雾散，花好月圆。

没想到，2013年1月中旬期间，东来的病情发生了惊天逆转。病榻之中，他始终心系南大和中美文化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心系他所钟爱的学术事业，关心学生的读书与生活，以顽

强的毅力与病魔做斗争。

病魔无情。东来没来得及跟朋友们一一挥手告别，就匆匆地走了。我远在海外，一时难以赶回南京，送他最后一程。回首往事，点点滴滴，不胜哀痛。35年前东北师大校园里拂面而过的那一阵清风，再也回不来了，只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无比的感伤。

唐代诗人于鹄有一首《别旧山》：

旧伴同游尽却回，云中独宿守花开。

自是去人身渐老，暮山流水任东来。

东来，云中独宿，天堂遨游，暮山流水，花开叶落，你不会寂寞的。

你会永远活在家人师友梦里，旧伴新朋心中。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8期

他没有“曲学阿世”——追忆东来

胡 成

王国维认为：文学可爱、哲学可敬、史学可信。这表明尽管都是作为人文学科，但史学较文学、哲学更注重学术积累。其学科规范（discipline）要求从业者长时间地搜集资料，充分阅读前人研究文献，并尽可能做到每一个字都要有来历和根据。这是一个不以岁月为功，而以终生为期的职业。否则，如何能够做到“可信”？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不乏青年大文学家、青年大哲学家，却难得见一位青年大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唐史研究者严耕望谈及自己“治学经验”时，对那些后来之人说：如果要想取得较大成就，史学家总得在五十岁以后，至少近五十岁，最好能活到七十、八十岁。他认为陈寅恪之所以大志不遂，“最基本的原因是身体健康太差”（《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4-105页）。然而，大自然的铁律却不管这些。疾病向来是不仅毒辣，随时可能击倒一个强者；且还十分阴险——它总是埋伏在暗处，不知不觉向人突然发起攻击。不治之症带来的死亡，绝不会对那些年富力强、正处在事业巅峰状态的史学家稍赐恩典、网开一面。东来五十二岁不到，被病痛不幸夺去生命，套用席勒的话说，如果连美都必得死亡，那么智者更无法规避，体现了生命极为冷酷和残忍的另一面。

我认识东来还是在1985年冬的哈尔滨。那是由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和哈尔滨军工大学牵头举办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国各高校研究生会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讨论会。当时研

究生数量不像今天这样成千上万，遍地都是，全国总共大概不会超过两千人，参加者自然多以天之骄子自居。记得最让人感到能够“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是来自北京、上海、长春、广州、南京等重点高校的一拨人，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就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进行磋商、讨论，乃至争辩。几天下来，中山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翟振明执笔写成了题为“教育改革应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凭记忆，不一定是原题）的宣言。也许振明本科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理工科出身，整篇文章全是重金属般的语言。开篇第一句：“我们不愿仅充当知识的存储器，而要做新时代的掘进机。”不过，东来作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会代表，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原因大概在于他是1961年生人，十七岁直接从高中上了大学，当时才二十四岁。相对而言，我们这些热衷参加者，大多出生于1950年代中后期，上大学之前有很长一段在农村、工厂或兵营，风吹雨淋、摸爬滚打的经历。现在想想，这里不敢说别人，我之所以那么热衷，除了对崇高理念的神往之外，很难说潜意识里没有一种对荣誉的渴望，以及要对那个独断权力进行报复的念头。面对我们这些颇多用心之心的老知青，东来看上去只是一个心地单纯、阳光灿烂的大男孩。

从史学追求“可信”的角度来看，这倒是东来做一位史学家最难能可贵的潜质。因为只有不太理会时下闹哄哄的各种论争，研究者才可能像进入实验室那样，不带任何个人主观偏爱，全神贯注地观察研究对象，探索科学真理。19世纪中叶被誉为“科学史学”之父（the father of scientific history）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e Von Ranke, 1795-1886），一句在世界范围内至今仍被引用的名言，是其在《拉丁与条顿民族史》一书前言中所说的：历史学家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作为一个具体事例，1834年至1840年陆续出版三卷本的《美国史》，也是美国史学开山之人的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 1800-1891），1867年被约翰逊总统任命为美国驻柏林公使。抵达柏林之后，他拜访兰克。兰克对他说：“你知道我在上课时怎样对学生谈到你吗？我对他们说你写的历史是从民主观点写成的最好著作。”据说，班克罗夫特听了这句内藏批评的表面恭维，稍稍吃了一惊，马上辩解道：如果他的书中真有民主思想，那主要是由于题材，即美国历史客观实在所具有，而非著作者的主观臆造。

问题在于：东来的专业在于美国史，及当代美国研究，与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关系密切，要想做些客观研究并不容易。中美之间的交往，大概始于1784年，那是第一艘美国货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出发，东行至佛得角群岛，经过赤道，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抵达广州，运送了四十吨人参。不可否认，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尤其是1949年中共建国之前，美国参与了许多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和帝国主义掠夺。不过，按照台湾著名中美外交史研究家吴翎君的话说，美国则还有较其它列强“相对友善的一面”（《美国大型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年版，第336页）。的确，就一个具体比较来看，美国对中国并非只是贪得无厌的攫取，且还有人道主义的慷慨捐助。同样把中国作为最大卖场的德国克虏伯公

司和美国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 (Standard Oil)，前者虽从李鸿章筹办北洋水师开始，直到蒋介石 1930 年代训练国军，获得了购买兵船和大炮的巨额款项，却没有为中国慈善事业投下一分钱；后者自 19 世纪下半期开始，就为城乡中上层家庭和各缫丝工场提供了主要夜间照明，并以“上帝的金币”为名，通过洛克菲勒慈善基金会属下的罗氏医社 (China Medical Board)，除创办了当时远东最先进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外，还资助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南开大学、东吴大学等一系列大学的学科建设。这是洛克菲勒慈善基金会在美国之外最大的海外教育慈善援助项目。再以最近解密的一系列外交档案来看，我们大致知道 1945 年的斯大林俄国，确有向外扩张的企图；1950 年的朝鲜战争，也不是美国蓄意挑起，就不能不考虑美国在其时中国的帝国主义，可能一定程度上还有些“不情愿” (reluctant)。

1920 年代初从俄国传入到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视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且与当时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紧密结合。1922 年结束的华盛顿会议，在美国的推动下，列强达成了“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这类“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协议。中国知识阶层中的领袖人物，尤其是那些开始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扮演领袖角色的留美学生，如胡适等人随风起舞，提出了“与美国友善”的口号，遭到左翼宣传家们迎头痛斥。1960 年由美国国家档案馆出版的美国外交档案缩微胶片的第 123 卷，有一封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于 1925 年 1 月 9 日致美国国务卿的机密信函，报告在当时中国风起云涌的“反基督教运动”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引述了蔡和森对美国在中国推行“门户开放”的评论。蔡和森说：美国“这样鬼巧的政策，不费一兵一卒得插足于宰制中国均势，别面又滥便宜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从此更专用文化侵略的政策，退回赔款增加留美学生，广派教士，在中国内部遍设青年会与教会学校，造成几十百万的亲美派。换过说，无异造成几十百万的内应队，然后再临以可怕的经济侵略——即新银行团，以全世界债主资格（美国现在为全世界债主）号召华盛顿会议，一跃而为领袖列强宰制中国之主人”（《由华盛顿会议到何东的和平会议》，《蔡和森文集》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 年，第 201 页）。

再至 1946 年，美国全面支持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内战国战；1950 年爆发朝鲜战争，两国兵戎相见，中共一边倒向苏联，此前被认为由美国文化侵略造成知识阶层中的“亲美”情绪，随即成为新政权急欲清除的心腹之痛。曾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1951 年返回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的巫宁坤，在自述性著述的《一滴泪》中，回忆了那场针对“亲美、崇美、恐美”情绪的思想改造运动。他谈到时任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由于被扣上忠心执行美国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之罪名，一次又一次在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待，接受教师学生揭发批判。或许这位后来被划为右派，强制到大兴安岭进行劳动改造的巫宁坤，在这部专门为西方读者书写的文字中，难免情绪化的夸大其词；那么我们还可以举出时在北京协和医院担任妇产科主任医师林巧稚为例。在协和的北京市委工作组，将她列为“重点改造对象”，派她

的学生给她讲形势、谈理论，反复劝导她“揭发美国人的文化侵略”，这让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多年培养，且又是基督徒的林巧稚颇感为难。在这样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年代，美国史研究自然成了“美帝国主义侵华史”。

作为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第一位美国史博士学位获得者，东来于 1989 年有了正式教职，1990 年代开始大量出版学术论述。与他的老师那一代人相比，东来至少有两点不同。首先，他的老师那一代人，基本上是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之下，开始了美国史的研究。对那一代人来说，长期受马克思主义理念的熏陶，研究的目的在于拨乱反正，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鉴别、分析、判断、阐明美国历史中的许多重要史实和问题。”（黄绍湘：《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重视美国史学史研究》，《世界历史》1983 年第 4 期，第 14 页）然而，对于东来来说，最大兴趣在于实证研究，通过收集和解读第一手档案，用资料说话，文章中很少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经据典。其次，他的老师那一代人，生长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大学期间有些就是左派。再至 1940 年代前后赴美留学，经历了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有较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研究中不乏对美国的批评。东来成长在中国日益成为一个地区性、世界性大国的时代。1990 年代他供职的单位，又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中美合办的文化教育机构，双方教授和学生在一个教室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其乐也融融。再加上他多次荣获美国学术基金会，如富布赖特基金会资助，前往欧美等国进行访问或合作研究。尽管这些地方还有点种族歧视，但已不明显。这都让东来具有较多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意识，更愿意从推进中美相互理解，以及从全球化角度来解读美国历史，而非特别在意于对其进行批评。

同样由于没有任何头衔、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罹患绝症的东来，自然不能享受由纳税人支付的正厅级学术官员之医药费报销比例和高干病院。在他最后的日子，住的是为升斗小民设立的三人一间的普遍病房，反而凸显出这位布衣教授的可亲和可爱。在他临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两天，我又一次去探访。那时他已经衰弱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只能我说他听。为了让他高兴，我谈到最能让他振奋的学术话题。提及其著述时，他忽然睁开眼睛，用不太清楚的声音咕哝道：“那都是小东西。”这让我格外感动。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东来是实话实说，并非谦虚。因为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对全球影响太大，美国史研究也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学问，载籍累累、大家众众，学术积淀相当丰厚。平心而论，东来的研究在国内虽属一流，但要走向世界，与日本、欧美那些高水平研究同行进行平等学术对话，似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东来一篇题为“书写美国史：一个中国前景”（Writing American History: a Chinese Perspective）的英文讲稿，坦承他们这一代中国学者将更多关注“如何”（HOW）的问题，以代替以往更多关注“为何”（WHY）的问题。因为在没有弄清楚“如何”之前，不必匆忙回答那些大的“为何”（several big WHYs）。所以，相对于英语世界的美国史研究，东来认为自

己只能做些基础性的“探微”，而非对精深理论大问题的探讨。

由此我们似乎更能理解陈寅恪《赠蒋秉南序》的深刻寓意。那是1964年，蒋秉南前往广州探望蹙足瞽目，年老体衰的陈寅恪。此时离他辞世的1969年，只不过还有五年时间。陈寅恪谈及其学术时，不无遗憾地说：“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不过，他认为可以“告慰友朋”的，唯有自己终生“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这里“学”的辞源，虽可追溯至中国传统意义上儒家经典的“正学”，但鉴于陈寅恪在日本、欧美游学多年，服膺“旧瓶装新酒”，善于融会贯通而不露痕迹，故我更倾向这个“学”中还汇入了韦伯所说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即一种对学术神召（vocation, calling）的意义。正是充满敬畏和虔诚，爱因斯坦自勉道：“我并不假装理解宇宙——它比我大得多”（I don't pretend to understand the universe— it's much bigger than I am）。的确，作为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在英雄末路之时一定能够意识到这种学术人生的不尽苍凉——既使投入再多心血的学术著述，在那个浩瀚无垠的未知世界里，以及那个“江山代有人才出”的学术发展大潮中，充其量不过是在海边偶尔捡到了一个美丽贝壳，在巍峨知识大厦构筑中增加了一块砖一片瓦。重要的是，如果坚持不“曲学阿世”，学术就有高昂的头颅，坚挺的脊梁，从而也有未来无限发展的希望。

需要做点说明的是，我无意对现有学术成果评估制度说三道四。在一个没有充分批判性讨论风气的学术环境里，由官方主持的各种学术奖项、重点基金的评审、首席专家的授予——诸如此类的学术声誉和头衔，很难说能获得多少在评审程序周密意义上的公信力，以及一定能够作为推进未来研究的标准（standard）。不过，有一个学术成果评估制度，总比没有好，至少可作为下一步在学术自治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完善的基础。此外，让一些人富起来，又总比让所有人都受穷要好。最令人担忧的是：一个极为功利性的市侩原则——在于你有什么，而不在于你是什么，正堂而皇之、肆无忌惮地成为现今衡量学术人生成败与优劣的唯一尺度，致使本来是纯粹的精神探求堕落至斯文扫地、物欲横流的“名利场”。具体说来，当年曾被孔子大力赞扬和褒奖过的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放到今天一定会被认为是学术事业的失败者、倒霉鬼，人们投向他/她的不是鄙夷，就是怜悯的目光。世变之亟，悲莫大焉！在这样一个劣质学术环境中，面对现实压力，可能更多应当说还是诱惑，我不能确定东来的内心，是否曾有过片刻的踌躇、犹豫、彷徨乃至动摇？即使有，那又何妨！毕竟，在东来的所有著述中，没有一篇是对权力的蓄意迎合、谄媚、奉承和捧场之作。他没有“曲学阿世”，这才是其一生最耀眼的亮点和最值得浓墨重彩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我欣赏、敬重东来。东来老弟，一路走好！

永远是一个青年

张千帆

南京大学历史系与中美中心教授、改革共识倡议人之一任东来因患癌症，不幸于2号晚去世，差两天即享年52岁。东来教授长期研究美国宪政史，生前著述颇丰，曾与人合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对普及国内宪政知识产生了很大影响。

东来兄是我所见过的为数极少的纯粹读书人。他临终前希望，天堂是一个图书馆，到那里可以继续安心读书、写书。但东来又绝不只是纯粹的读书人。他热爱生活，热情豪放，直率坦荡，还非常关心社会公益。我征求他是否联名改革共识倡议书的意见之前曾犹豫过，不仅因为他那时已经生病，而且怕他作为“纯粹学者”心高气傲，不愿参与呼吁请命这类“俗事”，却没想到他很爽快答应了。后来他来北京治病，我去看过他两次，聊起他当年牵头改组自己所在的小区业主委员会，那段时间饭吃不香、觉睡不好，为业主自治做了大量贡献，才知道他并没有停留在美国宪政的“彼岸”，而是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梦想的文明生活方式。

可怜南大历史系，刚走了高华，又走了任东来；一个研究中国史，一个研究美国史，都是业内的佼佼者。中国人喜欢说：“好人一生平安。”他们确实走完了平安而充实的一生，求仁得仁、问心无愧，但是他们走得太早。中国近几十年的规律是，那些什么正事都不干的混混们混得好得很，老也死不掉；真正的精英却遭遇各种压力、排挤、郁闷、辛劳，常常英年早逝。各位都是中国社会的精英，一定要好好保重，向刘绪贻老师、高放老师、郭道晖老师、郑振源老师、杜光老师、江平老师等前辈学习养生之道，不能再让混混们得逞，否则这个国家真成了混混的天下。

昨天是青年的节日，也是东来的生日。在这一天为他举办追悼会，意味深长。他到临终前，依然是一个青年。他的性格甚至他的生日就已注定了他永远是一个青年。他那张一贯带着笑容、自信、执着和略带天真的脸，将一个阳光青年的形象永远定格在我脑子里。

“天堂是座图书馆”——悼任东来教授

张千帆

“任老师去天堂图书馆了”。5月2日下午6时许，任东来教授的博士生江振春给我发了这则短信。东来教授曾在病榻上对人说，死亦不足惧。因为在他看来，天堂就是一座图书馆，到那里可以继续读书写作。对于凡夫俗子来说，图书馆可是一个够寂寞、够清贫的去处，但东来是一位纯粹的读书人，图书馆正是他的理想安息地。

临终前，他虽然承受着身体的巨大痛苦，大脑却异常清醒冷静，表情亦十分刚毅镇定，完全没有癌症末期病人那种昏沉凄苦的样子。我想，这一定是因为他把天堂这个图书馆当做自己的寄托，才表现得如此从容无惧。中国人祭奠死者，通常是烧纸钱、供菜肴，仿佛就怕冥间没饭吃、没衣穿、没钱花；日后祭东来，却很简单，放几本书足矣。能把图书馆作为自己的安魂之所，足见东来作为读书人的底色。

我不记得第一次认识东来是什么时候，大致是在2000年前后。东来和我们都属于“书虫”型，我比他更严重一点。东来性格比我更开朗，也更善于生活和交际，但是他和我交往从来是为了学术上的那点事，因而平时联系并不多，可以说是“书生之交淡如水”。

现在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他帮着南大（注：南京大学）中美中心的新任主任张罗，邀请我和几位学者去他公寓做客。当时，中美关系因坠机事件骤趋紧张，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聚会上，东来谈笑风生，一口流利的英语让人印象深刻。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爱国贼”这个称呼。还有一次请一位来访的美国教授吃饭，最后竟实行AA制。我在美国呆得久，当然一点不惊讶。其实我在南大召集学生吃饭，也都是实行AA制，学生也没有意见。

但是在“江湖”上混久了，已很难在国内看到这么有个性的做法。东来就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他从来是快人快语、直来直去，不恭维、不文饰，说话充满热情，颇有美国风格。有一次在紫金山开会，轮到东来主持，会场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那时我已来北京工作，看到久违的东来风格，备感亲切。

东来爱读书，但绝不是不关心世事的书呆子。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充满激情的人。据我观察，他一直有一个美国版的“中国梦”。追求幸福生活是每个人的天然权利，而东来追求的不只是他个人的幸福。在他的看似幽默的言谈中，不时闪现着一位书生对社会底层的关怀。

好几年前的一次经历让我记忆犹新，他和我都参与了南大历史系钱乘旦教授组织的一次项目评审。当时正值孙志刚案发生不久，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大谈起农民的迁徙自由和农民工在城里的不公待遇。席间有人揶揄他说，用他的“美国标准”来要求中国，未免太不现实；不信，放几个农民工在他家楼下住着，每天支起煤炉生火烧饭，看他受得了不。

也许大量农民进城确实会乱，但当代学者最稀缺的不正是东来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吗？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功人士不能为社会公正作出一点牺牲，甚至没有基本的道德是非，哪怕对弱势群体表示一点同情都不愿意，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希望？

我原以为，东来也和我一样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白面书生，虽满口“自由”、“民主”、“法治”、“公正”，遇到需要亲身投入的日常事务则退避三舍，理由一概是“没有时间”，却没想到他居然为所在小区的业主自治投入了大量精力，亲自设计方案、起草文件、打印选票，而且乐在其中。后来他成了小区名人，以至下楼散步总是被业主拉住聊天，迟迟回不了家。我相信他这么做并不是出于“大公无私”，首先为了自己家庭的生活更加美好，让小区治理更符合自己和多数业主的愿望，但这种理性的利己主义正是民主自治的要义。

健康和幸福不是靠独善其身修来的，当然也不是从政府那里讨来的，更不是靠自己的霸权夺来的，而是在共同维护社群生活环境的一点点中积攒起来的。以这个视角看，东来既有点像中国传统士绅，也有点像美国地方精英；他们都是“成功人士”，但是他们都积极投身地方公共生活之中，绝非只是坐而论道的“君子”或闷声发财的“小人”。

东来教授文如其人，他的文章带着热情、生动、轮廓鲜明的个人性格。他长期研究美国宪法，但是他的研究路径和宪法学相当不同。他还不只是单纯探索司法判例的历史，而是将影响判例的政治与社会因素连带写出来，也把法庭内外的逸闻趣事讲出来。

这种研究特色在其大作《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司法的 25 个大案》体现得淋漓尽致，记得当时也是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只觉得每个大案都写得栩栩如生，全然没有平时阅读宪法判例时那种艰深晦涩的感觉。初学者读了精心挑选的 25 个宪法判例，即能在欣赏故事之中轻松了解美国两百多年宪政的里程碑。当时就想，这本书肯定能畅销！对于普及宪法知识来说，历史学者很可能比宪法学者更合适。

东来和自己指导的博士生江振春合著的《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是其治学之道的延续，也是国内探讨持枪权的第一部系统专著。它以丰富的素材和详实的数据，探讨了美国持枪——控枪之争的来龙去脉及未来趋势。对于一个宪法学者来说，这本书的尤其可贵之处在于对美国联邦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形、发展及最高法院的判例演变提供了极为清晰的梳理。

完稿后，他在病榻上专门打电话来嘱我作序，表现了东来对学术的一贯认真。当时他已经相当虚弱，说话很吃力，只说了两分钟就挂了电话。其实，这点事让振春和我打个招呼就行了。但是对他来说，学术无小事，即便重病在身还是亲自过问每一个细节。东来这种兢兢业业的治学精神体现在他的每一本书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但愿东来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天堂图书馆。此时此刻，也许他正在那里注视着自己的家人，注视着自己奉献过的小区，注视着我们每一个人，默默地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加油。

痛悼任东来学长

徐国琦

东来是我的同门师兄。1984年我进入南开大学成为杨生茂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时，东来与何志功兄早在1982年即已成为杨先生为中国社科院培养的美国史弟子。1985年东来来到南开攻读美国史博士学位后，我们在南开共同相处的日子很多。我们同属杨生茂先生门下美国外交史专业，东来比我年纪稍长又是师兄，对我关照极多。如1986年东来到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深造时，特安排我住进他在南开的二人间博士生楼层，与赵伯雄兄共处一室。因老赵在天津有家室，我便常常一人独享单间，亦因此得以专心完成我的硕士论文。1988年东来博士论文答辩时，我忝任答辩委员会秘书。因东来为国内培养的首位美国史博士，答辩时尚无先例可循。但因东来的博士论文非常优秀，加上校内外专家对东来都十分看重和欣赏，东来的论文答辩因此圆满成功。其后我与东来又共同参与杨生茂先生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我承担美国内战到一战的部分章节，东来则负责一战后到二战期间的专章。在学问上我们经常切磋讨论。东来风流倜傥，博学多才，又广交天下豪杰。我在南开最幸福的时光之一就是与东来青梅煮酒论英雄，听东来臧否人物，评论时事。有趣的是，东来虽然能言善辩，但也有怯于表达的时候。有一次东来郑重其事的请我喝酒。东来长在北方，但温文尔雅，举止斯文，不像我大口喝酒，不修边幅。在我大灌了几杯啤酒之后，东来严肃地告诉我他有事相求：他已经爱上当时在南开大学旅游系读书的一位美女，但无法向其公开表明心迹，想请我做他的爱情使者。我立即满口答应，非常尽责的代为转呈。东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位美女就是后来成为东来夫人的吴耘。

我与东来密切交往大概只有2年左右。随后东来离开南开到南京大学进修，旋即在那里任教，我也在1990年负笈西渡，求学海外。从此痛失同东来切磋学问、把酒言欢的机会。大约2008年我到南京作短期访问，同东来、吴耘夫妇短暂一聚。近20年未见，岁月似乎没有在东来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他还是那么年轻，虽然不再像过去那样豪情万丈，但有了更多的学有成就的睿智与成熟。他当时同时在中美关系史及美国宪政史两大领域纵横捭阖，恣意潇洒。我相信若上天假以时日，东来定会在他的多种研究领域会成就一番更大事业。孰料今年三月底承剑鸣兄告知东来病危，我不禁悲从中来。立即给吴耘打电话，表示关切，期盼东来能转危为安。不想天不假年，竟让东来这样一位优秀学者英年而逝。悲哉！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东来在其短暂的岁月里，由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的第一个美国史博士到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位领军人物，著作丰富，教书有成。并有吴耘这样一位美丽贤惠的夫人及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儿，东来的一生是丰富的，成功的。我想其在天之灵应该也是幸福的。

东来所熟知的美国学者 Joseph Levenson, Perry Miller, 及美国总统肯尼迪等都是英年离世, 为后人留下永久的充满朝气、英俊潇洒的音容笑貌。东来兄的突然去世, 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思念, 更给我们留下了他那永远年轻、充满智慧的学人形象。

东来走了。希望东来夫人吴耘女士及其女公子任琬洁小姐珍重节哀。作为东来最爱的人, 你们好好生活和幸福平安应该是东来最希望的。

大洋彼岸忆东来

翟 强

从网上得知任东来去世的噩耗, 深感悲痛。在此之前, 已经获悉东来患了重病, 但一直相信他能康复。我是去年 12 月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开会时听说东来得了淋巴瘤的, 知道他正在接受化疗, 心里一直希望现代医学能回天有术。

东来仙游的消息使我不禁回想起多年来和他交往的点点滴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 1984 年夏天, 当时我还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硕士学位, 他和他的研究生同学何志功结伴从成都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后转道来南京。虽是初次见面, 但相谈甚欢。大家都是学习美国史的, 所以共同话题很多, 东来向我介绍他在社科院读美国史研究生的情况, 并转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都年会的花絮。他给我的印象是: 睿智、随和、开朗、健谈、知识面广、对国内美国研究圈子中的人头很熟, 可谓如数家珍。

南京初次相识后, 我和东来保持信件来往。1985 年夏我来美国读博士学位前, 收到过他的来信, 得知他已决定去南开大学和杨生茂教授读博士学位, 很为他高兴, 因为杨先生一直是我景仰的学者。东来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去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任教, 这又给了我很多与他重聚的机会, 因为我父母在南京工作和居住, 所以我常在暑假中回去看他们, 也会同时去南京大学找老同学叙旧。中美文化中心是我常去的地方, 可以见到东来, 可以见到我的研究生同学蔡佳禾, 还可以在中心图书馆翻阅中文杂志。在南京这样一个夏天素有“火炉”之称的城市, 中美文化中心内由于有中心空调, 清凉无比, 是一个很惬意的谈话场所。每次和东来聊天都很开心, 他信息量大, 让我及时了解很多国内美国研究的动态。有一次, 我们还专门讨论应如何翻译英文 (affirmative action) 一词。有时, 他会邀请我去和他带的研究生座谈, 讨论和冷战史有关的问题。还记得有一次他领我和在中美文化中心访问的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 David Mayers 一块去南京东郊的“航空烈士公墓”参观。参观结束后, 我感触很深, 暗自思忖: 东来怎么会知道那么一个地方, 因为我从小在南京长大都没有去过那里,

后来想想，“航空烈士公墓”纪念的是在抗日战争中在华捐躯的美国、苏联等国的飞行员，而我成长在反帝反修的火红年代，那时是不会大事颂扬抗战中美苏对中国的援助的，我小时候常去的是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

我和东来在美国也见过面。那是在1992年夏，我们在美国华盛顿相聚。那次聚首的缘由是：留美历史学会在马里兰大学举行第六届年会，同时邀请了正在美国访学的中国学者参加，东来和牛军当时正好在北卡罗莱纳大学进修，应邀赴会。东来在会上向留美历史学者介绍国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状况。会后，我还去东来和牛军在北卡罗莱纳大学的住处短暂逗留。

我最后一次见到东来是在去年5月末。我当时应邀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作有关“西方冷战史研究近况”的讲座。讲座结束以后，和历史系老师聚餐，东来也赶到。他说他刚从上海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回来。席间，东来讲述在上海开会的见闻。他还告诉我：他上半年在美国衣阿华州 Grinnell College 访问，一边从事学术研究，一边陪他在那里读书的女儿。他在谈到女儿时所表露出的自豪和父爱，让我感动和羡慕。当时，东来一切显得很正常（两个月后，他被确诊患了淋巴瘤）。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是永别。

东来英年早逝，天人永隔，实乃美国研究领域一大损失。愿东来一路走好。

2013年5月4日于蒙哥马利

A Dynamic, Lively, Inquisitive, Well-read Professor

Laurene Wu McClain

Dear Prof. Ren Donglai's wife and daughter,

With a very heavy heart, I read about Professor Ren Donglai's death earlier this year while surfing the net. Soon after I wrote to my friend, Professor Yongtao Liu at Fudan University, about Donglai's death and Prof. Liu told me in a response e-mail that Donglai's death was caused by cancer.

Donglai and I met in 2001 when he was one of the 15 or so Chinese professors who participated in a workshop called "Understan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th approximately

six American professors, at the East-West Center in Hawaii. I was one of the United States professors. I became very well acquainted with Ren Donglai--a dynamic, lively, inquisitive, well-read professor at the Nanjing U. - Johns Hopkins U. Program. He took the Seminar and all social activities seriously. I could not believe how much he had read about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and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ses dec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Aside from our intellectual discussions, I remember telling him about snorkeling. Almost as soon as I told him about how terrific Hanauma Bay was, he and a few of his colleagues bought snorkeling gear to practice in the U. Of Hawaii pool. The day that the professors went to Hanauma, I was a little late in getting there when I heard someone yelling, "Laurie, Laurie, Laurie!" and here was Donglai emerging from the "red banner"--not safe area of the Bay. I was somewhat alarmed, but obviously he wasn't, because he had seen the gorgeous fish below and was exhilarated.

One night, about ten of us decided to go out to dinner together. Donglai had been to "Mama Gotso (?)," an Italian restaurant and suggested going there. I happened to have a small rental car for visiting my brother's grave site in Kaneohe, and offered to drive. About seven of us piled into my car while someone from the East-West Center drove the three others. We had a marvelous time--full of fun, wine, and laughter. Afterwards, Donglai asked me to drive a group of them "any place." I took them to Kahala--a spiffy resort past Diamond Head. The professors were so excited about the beauty of the resort, the dolphins in the pool, and the beach that they wanted to linger.

After having spent some time together, Ren Donglai broached the idea of my writing a chapter for his upcoming book on important U.S.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I told him that I would be glad to do it, so I wrote about the historic Yick Wo v. Hopkins (1886) case. He translated my chapter into Chinese, and then asked for still another chapter on the Japanese internment cases. I recommended my husband Charles McClain since he had already done some writing about those cases. (Charles teach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Donglai agreed that Charles would make a good contribution to the book. The book was published in 2005 at U.S. Supreme Court Cases: 25 Case Studies and we have heard that the book has received a tremendous following in China.

I met Ren Donglai again in Nanjing in 2002, this time with you, his sweet daughter, as a group of us went to the Sun Yatsen Memorial, and Charles who was teaching one summer at the Suzhou

law school, met for the first time, Donglai and both of you for a meal in Nanjing.

While we corresponded by e-mail, I never saw him again, but my memory of him is still very clear in my head. What a wonderful person he was. I feel very fortunate to have known him, and I give both of you my condolences. His work has left an important legacy in China, and Charles and I will never forget him.

Sincerely,

Laurene [Laurie] Wu McClain
History Department
Mailbox: L137
City College of San Francisco
50 Phelan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12

快乐的任东来

张小明

今年5月3日，正在福建老家探亲的我，获悉任东来教授已经于前一天在南京去世。最近几个月来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又一位颇有才华的中国学者英年早逝！这些天来，东来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

东来只比我长一岁，但他上学早，成名也早。我还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就读过他写的作品，也很佩服他的才气。虽然我很晚才认识他本人，而且和他见面的机会也总共只有那么几次，但是我们每次在一起的时候都谈得很愉快。在我的印象中，他既是个严谨、求实、博学的学者，也是自己享受快乐并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

我和东来都做过冷战史研究，算是同行，也正因此而相识。1994年1-7月，我得到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参加冷战国际历史研究项目，主要是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从事美国官方解密文件的研究。我的办公室在乔治·华盛

顿大学格尔曼图书馆的六层，离复旦大学吴心伯博士的办公室不远。当年7月，就在我将要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天，东来突然找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他刚刚抵达华盛顿，也是来参加威尔逊中心冷战史项目的，而且要在华盛顿呆3个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真没想到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华盛顿，而且还是在美国参加同一个研究项目！

在我的最初印象中，他是一个极具亲和力、很容易交往的学者。东来初来华盛顿借住在朋友家，正准备租房子住。他听说我在国会山附近租了个 Studio，那里交通方便，离国家档案馆以及国会图书馆也近，有意租这间房子。我当天就带他回我的住所，他看了以后很满意，我随即便和房东联系上，在美国国会研究处工作的房东知道后也很高兴，因为这么快就有新的房客续租他的房子。我走的当天，东来与薛谋洪大使的助手张昆生一起来送我，昆生开的车。后来听东来说，他很喜欢我们住过的那所房子，在离开华盛顿之前把我留给他的那台旧电视机又转送给一位来自国防大学、在大西洋理事会当访问学者的中国教授。

1994年夏天从华盛顿回北京之后，我给东来邮寄过一本我的书《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那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正好是我人在华盛顿的时候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我在美国跟东来提过这本书，他也表示以后想看一看。1996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听同事说，最新一期的《美国研究》登了一篇我那本小书的书评。我赶紧到阅览室找来那本杂志，一看才知道是东来写的书评，题目为《凯南的遏制思想与美国的遏制战略——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读后》，登在《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上。东来的这篇书评，给予我这个迈入国际关系学界不久的年青学人以很大的精神鼓励和支持。他这样写道：“这是本小书，但它比时下许多大部头的书更有份量；这是本研究别人思想的著述，但比现在众多‘理论’专著更有价值。这是我读完张小明博士《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后的第一个印象。”与此同时，东来也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对我书中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性的看法。他的评论十分到位，学理性很强，文笔也极好。我一直对此心怀感激。

我和东来的第二次见面是在2010年夏天，而且又是在美国，但距离第一次见面已经整整16年了。这一年的7-8月间，我参加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举办的“太平洋战争遗产”暑期研讨班。碰巧东来也参加了，我们因此一起在夏威夷呆了一个多星期。由于订票有些晚，我没能买上会议组织方指定到达夏威夷日期的航班，所以只好买了一张提前一天到达的机票，并经过一番努力，让夏威夷大学同意我租一天该校的宿舍。没想到我到达夏威夷之后收到东来的电子邮件，获知他竟然也是当天抵达，而且没能租上房子，正发愁到了以后怎么过夜。我的航班是下午到达夏威夷，东来的航班则是当天深夜的。我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他到了以后找我。我租的那个学生宿舍里面正好有两张床，我们一起住一晚没问题，我也和宿舍楼管理员打好招呼。那天晚上，由于十多年未见面，加上倒时差，我们几乎没有睡觉，而是趟在床上聊天，谈了很多事情，相互了解到了对方最近一些年来的生活与工作。记得东来在提起自

己正在美国上大学的女儿时特别的兴奋，我能感觉到他真是一个快乐的父亲！

在夏威夷的那些天，我们过得很轻松、愉快。当然，东来功不可没。他性格好，人很随和，比较健谈，而且还特别会玩，把家里的沙滩垫、潜水镜什么的都给带来了。他以前在夏威夷呆过一段时间，对当地相当熟悉，因此自然成了我们几位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的导游。到达夏威夷的第二天下午，东来就带着我以及我的室友台大的苏宏达教授去著名的海滩 Waikiki 游泳、看表演、吃晚饭（日式炒面），玩到很晚才回到住所。这可能是我们来夏威夷之后最为休闲、放松的一天，真的有度假的感觉。为期一周多的研讨班主要是集中听课、参观和讨论，安排得比较紧张，也比较的累。东来多次带领我们抽空去放松心情，用宏达的话来说，我们是去海边发呆。一天下午听完课之后，我们几位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同行在东来率领之下一起坐公共汽车去了海边，找了一个风平浪静的海湾游泳，然后上岸观看和拍摄日落美景。我们坐在东来带来的沙滩垫上聊天，晚上大家一起逛商场、吃饭，然后再坐公交车回到住所。还有一天下午，那应该是所有与会者准备次日主题发言的时间，但我们大都跑去海边或者博物馆了。我们几位来自中国大陆、台湾的同行再次结伴外出，和一些美国、澳洲来的教授们一起去了当地海洋自然保护区“恐龙湾”，在美丽的浅海中游泳、观鱼。东来还是主动当导游，并再次带上了那块沙滩垫。这是我来夏威夷之后第三次到海里游泳，而且这次因为戴了东来借给我的潜水镜，还有幸在海里看到美丽的热带鱼。可惜我的潜水技术太差，没能看见几条鱼。东来和宏达都说见到很多鱼，还看见过海龟。晚上我们一起在一家越南餐馆吃饭，然后坐车回到夏威夷大学宿舍，并开始熬夜准备次日的发言稿。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观看和讨论 Arizona Memorial 有关珍珠港事件的前后两个版本的电影，东来因带了几个同事去著名的 Diamond Head 爬山而缺席。我那次没有跟着去，但后悔不已。每每想起在夏威夷的这段生活，我的心中总是充满喜悦。

参加完这次研讨班之后，我和东来一起去机场，开始了回国之旅。我们搭乘同一架班机先飞到韩国仁川机场，然后分别转乘各自的航班回北京和上海。因为有东来作伴，回国的长途飞行好像不那么累了。由于在仁川机场转机的时间比较长，我和东来在候机室继续聊天。好像听他提过以后想多开车外出旅游，并且打算把家里那辆已经开了很多年的小车，换成油电混合动力的新款环保型汽车。我当时也表示希望以后有机会和他结伴自驾游。我在机场请东来吃了碗韩式乌冬面，这是我们一起在韩国吃的一顿晚饭。饭后，我们便前往各自的登机口。

这次回国之后没过多久，我们就又见面了。这是因为东来给了我一个去他任教的南京大学讲学的机会。2010年9月的一天，我收到东来的一封邮件，他邀请我选一个合适的时间去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就我新近出版的著作《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给那里的中外学生做一次演讲，题目定为“中国参加国际社会：英国学派的观点及其批

评”。按照约定，我于当年 11 月初前往南京大学，在匡亚明报告厅给中外学生上了一堂课。这次南京之行，使得我有机会同东来再次见面，并且还见到了南京大学的蔡佳禾教授、石斌教授以及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周桂银教授等多位同仁、好友。在南大的时候，东来领着我参观中美文化中心大楼，并在他的办公室坐了一小会儿。他也带我去看南大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等老旧建筑，一路上给我讲了好多与南大校园有关的历史故事。我们还一起坐观光电梯登上了南大附近的一栋摩天大楼（听东来说那是南京最高的建筑）的观景台，俯瞰南京城。深秋的南京城已经有些凉意，但我感觉心里很温暖。

去年 8-10 月间，我因病在医院治疗，上午输液，下午进高压氧舱，没有上班。记得是在 9 月中旬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东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他在信中说，自己于 7 月初被诊断出鼻部结外淋巴瘤，已在医院做了两期化疗，医生现在建议再做一个放疗。他在网上搜索发现中国医科院放疗科有一位专家对此有很好的研究和治疗，因此想来北京，但担心约不上医生。他希望我能够联系上袁明教授，请袁老师和韩老师帮助引见、求医。尽管东来在信中对自己的病情轻描淡写，特别跟我说多亏发现得早，没有什么大问题，我看到这封邮件之后还是感到十分震惊，赶紧把他的信转给了袁老师。后来听袁老师说，她很快就帮东来联系上专家，东来也来到了北京，而且治疗效果不错。我因为身体不好，没能去医院看他。在东来离开北京之前，我和他通了电话，他还是那么乐观，而且不忘叮嘱我注意休息。我也相信的性格活泼、开朗的东来能够战胜病魔。没想到这竟然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今年 4-5 月间，我去趟老家探望病中的父亲，还没有回北京就得到了东来已经于 5 月 2 日去世的消息。

东来已经西去，作为曾经同他有过愉快交往的一个朋友，我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依然快乐！

2013 年 5 月底

吊唁东来

卢 林

惊闻东来仙逝，万分痛惜！

1987-88 年，我来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习，有幸与东来相识，东来的热情和学识给人印象尤深，其对历史掌故的熟悉，对学术研究的认真，以及以小见大，用通俗故事展现精要大意的能力远在众人之上。

离开中心后，通过对中心的回访和参加学术会议，与东来多有接触，受益匪浅。

记得是在 1990 年或 1991 年，东来分到了房子，十分高兴。时值我出差南京，其夫妇俩还盛情邀请我府上一叙。那是彼此国内的最后一面。似乎是 1992 年，我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接近尾声，行将赴康乃尔大学就读博士，天赐良机，恰逢东来造访美东，有幸在 DC 重会，叙旧议新，十分过瘾。

此后，虽然时常关心他的研究，毕竟大洋之隔，未曾有机会再面。

如今，二十余年前的欢聚，居然恶变成为永诀。遗憾之痛，殊难言表。

东来为人坦荡，处事惟谨，倾心学问，淡意名位。痛哉人杰如是，命其何短？维望遗属节哀，愿其所爱之学，后继有人。

唁于美国新泽西

与东来兄的最后一面：悼任东来教授（之一）

杨玉圣

任东来教授去世了。

这一噩耗，是东来在南京大学培养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也是我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同事胡晓进兄打电话告诉我的：晓进打来电话的时间是 2013 年 5 月 2 日 18:20，说他刚刚得到消息，任老师已在南京鼓楼医院去世。稍后，18:45，东来夫人吴耘教授又给我打来电话，告知东来是 18:10 去世的，走得很安详。

接到电话时，我正在从南京回青州的高铁上；彼时彼刻，我后悔极了，因为尽管跑去了一趟南京，也看望了东来，但终于未能陪东来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其实，我只要态度再坚决一些，那么，就不会留下这个遗憾了：2 日下午 17:46 分，我乘坐的自宁往青州的 G234 次，才刚刚开车；而此前的 16:20，我和李剑鸣教授、张成明律师等刚刚离开鼓楼医院。此前，在南大—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东来的办公室里，吴耘老师接到电话，说大夫正在抢救，我们随即往医院赶，其中东来的女儿琬洁和成明、我几乎是一路跑着奔回医院的。大夫和护士正在抢救，东来呼吸困难，插着氧气，又从仰面躺着侧身翻过来，眼睛闭着。握着东来的手，我不愿意放开，哪怕再延长两天，即 5 月 4 日，就将是东来的 52 周岁生日了，也是东来的恩师杨生茂先生逝世的日子。可是，东来还是匆匆走了。

还在十多天前，即已在京和剑鸣兄约定，拟于 5 月 5-6 日一同往宁看望已病重住院的东来。因为当时晓进去找我，他说 3 月份去医院看望任老师，病情已经严重恶化。我因为参与

筹备“首届县域法治高端论坛”，于4月27日回故乡青州，又拟于会后往孟子故里参观考察，原计划于5月4日到京后，稍事休整，即和剑鸣一起往宁，看望我们这位共同的好友。可是，5月1日，接到剑鸣的电话，说他到武汉开会遇到南大的朋友、打听东来的病情时，都说病情在进一步恶化；当剑鸣与吴耘老师通话时，当听说我们将于5月5-6日往宁的时间安排时，吴老师担心届时恐怕就来不及见面了。于是，剑鸣和我商定5月2日到宁，剑鸣自北京、我从青州分别前往南京，然后一同去看望我们都特别尊重的这位学长。

因为都是乘的高铁，而且从北京到南京、从青州到南京的距离差不多，发车时间也相仿，故我和剑鸣先后于中午、几乎同时到达南京南站。好友张成明律师和他的助理小吴，已在车站等候。会合后，我们一行直接到鼓楼医院附近的快餐店，除剑鸣已在车上吃过午饭外，我们三人简单就餐。按照剑鸣和事先吴老师约好的下午两点左右去探视的时间安排，大约两点二十左右，我们即到达十三层东来住的病房。房内有三个床位，但只住着东来一人，吴老师和东来的一个弟子在。同去的除东来和我外，还有成明和小吴。东来仰躺着，眼睛闭着，喘着粗气，很虚弱的样子。不过，当听说我们来看他时，立马睁开眼，很欣慰的表情。我握着东来的手，一丝丝悲凉涌上心头。“玉圣，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别太拼了。不然（像我这样），一旦得病，就麻烦了”；东来又转向剑鸣说：“剑鸣，你也要注意锻炼身体，别太累了”。嘱咐这些话时，东来思路通畅，吐字清晰，刚正坚毅，正是我所二十多年来既熟悉又亲切的声音。对于仅在去年11月底在家中见过一面的成明律师，东来也表示“知道。记得。”东来说：“没有想到这么快”，然后一阵静默。我猜想，热爱生活的东来一定在慨叹命运的不公。剑鸣和我，除了那些无力的安慰外，又能做些什么呢？

怕人多打扰东来休息，吴老师带我们到另一个房间聊了一会儿。从吴老师处得知，东来的求生欲很强。去年7月4日刚查出病时，东来还很乐观，说自己活到八十岁没问题；哪怕是在恶化后，也觉得能再活三五年不成问题。最后，觉得很痛苦。不过，他说自己虽然有遗憾，但也很欣慰，因为太太很贤惠，女儿很能干，学生们也很有出息，但他不希望外地的朋友和学生都来看他，因为那样的话，他很痛苦，朋友和学生也很痛苦。因为我和剑鸣已买好当天的返程车票，但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故随后吴老师提议我们一起到东来在南大中美文化中心的办公室去坐坐，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我们先返回病房，再看看东来，握着东来的手，表达敬意和安慰。在我的建议下，吴老师也很赞同，躺在病床上的东来，与剑鸣、成明和我留了一张合影。这张由吴老师拍摄的合影，很可能是东来生前最后一张与友人的合影，因为此后两个小时许，东来即离开了这个世界。

鼓楼医院和南大一墙之隔，吴老师带我们四个人步行前往，大约十几分钟后，即到达东来在二楼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一张写字台之外，除了书，还是书。看到《生命的厚度》这一关于东来生平简介的小册子，我建议既是东来师弟和好友、又是书画家的剑鸣为之题签，

吴老师也很赞同，好在中心书画室有现成的笔墨宣纸，剑鸣遂如此照办；同时，作为诗性法律人的成明，亦现场成诗一首：“少年任东来，翩翩泛学海。治学逾卅年，学富五车载”，随即又书赠吴老师。我主要是就《生命的厚度》草稿中的一些格式，提了一些参考性的建议，供吴老师参考。琬洁因昨晚在医院陪床，故在东来的办公室打盹儿。记得1998年春夏之交时，我曾见过刚上小学的琬洁小朋友；后在南京师大附中毕业后，琬洁直接留学美国。去年6月份在北京见东来时，说起自己的掌上明珠，东来合不拢嘴，自豪不已。即将从格林奈尔文理学院本科毕业并被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录取的琬洁，已出落成婷婷美女、知性才女，落落大方，知书达理；最近几个月，专门自美回国，陪护父亲左右，尽孝，连住院、用药等事项，吴老师说，都是由女儿决定的；已经懂事的孩子，还变着法子，像大人哄小孩那样，让病重中的东来尽可能开心，东来之把琬洁引为他最自豪的人生骄傲，确乎是肺腑之言。吴老师本来说要我挑一本东来的书留作纪念，这也是我求之不得的，但吴老师随即接到医院来的关于正在抢救东来的电话，于是，我们就赶紧往医院赶了。

琬洁年轻，个子高，又穿着运动鞋，跑在前面，也跑得最快。成明和我随后，也跟着跑，待赶到医院时，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一幕。我本是想退掉返程车票的，但吴老师表示：东来一定不希望给朋友添麻烦，建议我们还是往车站赶车。时间有些紧，我和成明及开车的小吴说：按正常情况开车，若赶不上车，即是天意，就把票退了，住下来；剑鸣的车次，要比我晚二十分钟开车，但也表示：只要我赶不上车，他就留下来陪我，我们一同陪东来。可是，天不留人，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南京南站，各自顺利登上返程的高铁。未久，就传来了东来辞世的噩耗。

无论如何，我和剑鸣以及成明与东来还是有缘份的，因为我们终于在东来走之前见上他最后一面：不！其实，是见了“三面”：第一次，14:20-14:35；第二次，14:45-14:55；第三次，16:05-16:28。只是前两次，我们都和东来说了话；最后一次，只是握手，未再惊扰东来，惟有默默的祷祝。

生活就是这样残酷，人生就是如此冰冷。热爱生活的东来，就这样走了。离开了他的爱妻、宝贝女儿以及学生、同事和朋友，还有他未竟的学术事业。

2013年5月3日 凌晨1:20

于青州颐寿山庄

学术生命之树常青：悼任东来教授（之二）

杨玉圣

2013年5月2日下午，按照事先的约定，李剑鸣教授自北京、我从青州分别往宁，一同去南京鼓楼医院看望已经病危的好友任东来教授。然而，孰料在我们离开不到两个小时后，还刚刚嘱咐我们要“多注意身体”、“别太累了”的这位中年才俊，即离我们而去了：5月2日18时10分，东来因患淋巴瘤医治无效而撒手人寰。

东来是我特别敬重的一位美国史同行，也是相交近三十载的一位挚友。东来的病逝，让我尤其难过。

论年龄，东来在我们中年这一辈美国史同行中，并不算大：17岁读大学，21岁读研究生，27岁获得博士学位；1988年，东来自南开大学毕业，成为已故美国史泰斗杨生茂教授指导的中国恢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之后第一个美国史博士学位获得者。因此，论资历和学术辈份，东来又是我们这一代美国史学人中的“大哥大”。

东来是一位早慧的学人。在我们这一辈人中，东来大概是最早发表作品的，先是在《读书》等杂志发表美国史书评，后在《世界历史》以及《美国研究》、《历史研究》等专业刊物发表关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专题论文，还在《南方都市报》开设过每周一期的国际问题时评专栏。东来不仅是我们这一辈人中最早的美国史博士学位获得者，而且也是撰写书评、时评和学术评论最多的佼佼者。

东来最早的专业领域是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他的博士论文《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后于199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旁征博引，论证严谨，自成一家之言，迄今仍是代表中国学者关于该问题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的一部优秀作品，也是改革开放以来讲求学术规范、追求学术创新的中国美国史专题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之一。《政治世界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小视角下的大历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集中反映了东来到那时为止对有关问题的既有历史深度、又有人文关怀和独到学术视野、文化品位的专题论文和评论。之后，东来的学术重心自觉地转向美国宪政史特别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史的研究，这包括开设专题课程、培养博士研究生、申请立项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发表专题研究论文、翻译有关学术著作，并与其同事或学生合作出版了在学界内外引起广泛反响的《美国宪政历程——塑造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最有权势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关于美国十大法官的合传也已接近尾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开拓性地开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史的研究方面，

东来是中国学界贡献最为彰著的一个领军性学人。

东来的学术评论，也堪为学界表率。除了大量的书评、综述外，东来还写作了许多见地深刻、中正平和、与人为善的史学评论佳作。东来关于学术规范、学术抄袭问题等的评论，进一步体现了他刚直不阿、仗义执言的学术正气。对于其恩师杨生茂先生（《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杨生茂教授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的贡献》）、丁则民先生（《冬日里那温暖的阳光——怀念恩师丁则民教授》）及李慎之先生（《“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追记李慎之先生》）、冯承柏先生（《一个永远追求新知的学者——悼念冯承伯教授》）和邓蜀生先生（《不是吾师，胜似吾师——祝贺邓蜀生先生九十华诞》）、曹德谦先生（《神秘的“侗西”——祝贺曹德谦先生九十华诞》）、刘绪贻先生（《像刘绪贻先生那样生活》）等美国史学界前辈学者的怀念之文或忆旧之作，不仅感情真挚，而且文风素朴，娓娓道来，在散淡中尽显其灿烂华章，充分体现了东来一向尊师重道、充满人文情怀的谦谦君子之风，堪称有思想力度的学人美文。而且，在这些关于前辈学者的美文中，在我看来，也恰恰映照着东来自己的影子：和这些前辈一样，东来又何尝不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永远追求新知的学者”呢？

东来还是一位少有的热心公益并身体力行的中年名家，这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当今，尤其难能可贵。这种可贵的学术公益精神，不仅体现于他“甘为他人做嫁衣裳”（如与黄安年教授等发起编纂《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而且还反映在他走出书斋，把宪政—法治与民主的理念用于其所在小区的业主自治实践：东来不仅在其小区发起召开了业主大会会议，并当选为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而且还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小区业主维权，维护了全体业主的权益。以诺大的中国，在数以百计的美国史研究者中，似乎还只有东来和我曾经以业主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投身于小区业主自治实践。我曾几次听东来兴奋地谈起他带领小区业主维权成功的故事，也曾想找个机会专门就此对他进行个案访谈，以充实我关于业主自治与小区善治的研究，可惜，由于我的懒惰，随着东来的猝然辞世，这一访谈已经注定是永远不可能的了。

记得中国近代史大家陈旭麓教授曾把学者的生命看作是自然生命与学术生命的集合。就自然生命而言，东来英年而逝，让人不胜遗憾之至；然就学术生命而言，东来用他那些高水准的学术论著、用心血培养的有出息的任门弟子证明：其学术生命之树常青。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慨叹和遗憾的同时，东来也理应感到心安和欣慰。据东来夫人吴耘教授在电话中跟我讲：东来最后走得很安详。这让我在心酸中倍感慰藉，因为我深深地知道：东来是有理由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的，因为在病中他一直有挚爱的妻子、能干的女儿陪护左右，朋友和弟子们也不时去看他。如今，东来因为知足而心安，因为心安而安详，尽管他由于这罪恶的癌症而不得不遗憾地离开了他的爱妻、宝贝女儿以及学生、同事和朋友，还有他已入佳境但未竟

的学术事业。

再过一天，即5月4日，就是东来的52周岁生日了，也是东来的业师杨生茂先生的忌日，但东来来不及过这个生日了。东来之丧，天妒英才。天公不公，莫过于斯。生活就是这样的残酷，人生居然如此的冰冷。热爱生活、渴望生命的东来，就这样走了。

东来常说：杨先生虽得享九旬另三高寿，但晚年寂寞，他很后悔自己没能多到津去陪陪老人家。也许，东来是提前和杨老在天堂相聚了。这大概是我们这些生者在悲哀之余惟一聊可慰藉之处。

在写这篇小稿时，天际不时传来阵阵的春雷，伴着闪电，窗外下着悲戚的春雨。或许，连苍天也忍不住为东来之早逝而悲歌罢？

东来安息！

2013年5月3日 4:23

泣笔 于故乡青州

写在东来离开我们一周之际

陈晓律

东来走了。作为多年的同事好友以及当年在曲钦岳校长德政下而同时入住南大北阴阳营大院十多年的舍友，我十分难过。

今天，是东来离开我们一周的日子，忍不住又想写上几句。

东来自到我们世界史学科以后，共同参加了很多活动。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除了其学术才华和过人的学术见识外，则是东来严于律己的精神和遵时守时的人品。

世界史学科常有活动，只要东来在南京，即便是有课，也要在课程一结束后立即赶来参加活动。同时，只要参加这些活动，东来绝不迟到早退。其态度之严谨，完全没有一个大牌教授的架势，反倒如同一个刚进校门的学生。

联想到国内一些学术会议，各种溜会和逃会的现象屡见不鲜；到闭幕式时，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各类“大家”视会议的发言人与主办方为端茶送水的店小二，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份量”。对比之下，此等“大牌风韵”在东来身上的“缺失”，到更显出东来人品的珍贵，也彰显出他一贯倡导的宪政精神。

可惜，如此学人，如此人品！在我们今后世界史学科的学术活动中，东来将永远缺席了。

2013/5/9

东来一直有一个梦

陈晓律

东来走后，本以为丧友之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漠，没有想到东来鲜活的印象反而越来越清晰，结果是始终无法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那就再写上几句吧。

东来常说，他的原则是“崇洋而不媚外”，那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引进国外先进的理念和制度设计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而不是“获得主人的夸奖”，得到某种“赏识”。换言之，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是他关注的基点，无论学习什么、宣扬什么，都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因此，他特别痛恨那些口是心非的行为，对那些一边高调谴责“某帝国主义”，一边又将子女送出去受“帝国主义教育”的人，十分不满。有一次，甚至为此冲上街道与游行的学生辩论。其“单纯幼稚”，由此可见。

东来一直有一个梦，那就是中国的强国梦能与美国的中国市场梦找到一个对接的路径。因此，即便在病中，他也依然关心着这些方面的学术动态。

4月中旬，有次去看他，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看到我十分伤感，但所提的要求却出乎我意外。他说：对不起，我不能坐起来与你谈了，但我还能听，我就闭着眼睛听你谈谈最近国内的学术动态吧。

我谈了一会儿，实在不忍心，就停了下来，没想到他却说：“晓律，我在听，继续谈吧。”于是，我只好又坚持下去，一直撑了一个多小时。我看他已经无力说话，才停了下来。

此时，他闭着眼，但还是坚持将一只手伸出来，缓慢地晃动几下，向我表示再见……

星星点点忆东来

陈仲丹

任东来是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专职教师，也是与我同一专业（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研究生导师，还曾一度与我是前后两栋楼相望的邻居。

当时东来住的房间比我住的还小。本应都是一样大的两室户，但他住的那栋楼位置正巧在新石器时代的北阴阳营遗址之上，据说是被挖过地基承受能力有限，后来就没有扩建，所以面积要小一点。东来夫人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那套窄陋的居室，说是他有着与生俱来的阿Q精神，身居陋室而安之若素。